



——“2008年社会学年会”相关研究综述

Women's Development in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 Overview of Gender-Related Researches in the 2008 Sociological Annual Conference

马冬玲 [1]

2008年7月20-23日，第18届中国社会学年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7月22日，由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主办、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社会学子网络承办、东北师范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协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与女性发展”论坛如期进行。先后有108人（近1/3为男性）参加本论坛。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65篇，其中40篇收录进论坛论文集，24人做了发言（近1/2是男性）。另外，同期举行的其他论坛里也收录了5篇与女性发展相关的文章。上述文章涉及到女性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教育等诸多领域，研究方法以社会学方法为主，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视野与方法。现根据文章议题将之简要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政治、经济与女性发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与家庭、妇女的互动关系进行性别反思。她在文章中提出，在中国市场化转型导致的剧烈经济变迁面前，女性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在特定的家庭劳动分工的意识形态和家庭应对市场化变革的特定条件下进入廉价劳动力市场，而女性劳动贡献和其边缘地位又被巨大的经济增长所掩盖。应该说，正是经由市场化过程和家庭的中介，才形成女性这样一个稳定的劳动力蓄水池。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蒋永萍的文章讨论了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家国同构制度安排，在今天的妇女中留下了怎样的历史记忆，以及这些历史记忆对于中国转型社会的性别建构的意义。她指出，国家对妇女进行“国家人”和“家庭人”的双重建构形成了“两性同样是国家人前提下的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性别角色建构模式。她认为，必须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家国同构”对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所发挥的积极意义，如提高女性经济自主性和独立意识等。

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林仙注意到，女性创业者往往被称为“老板娘”而不是“老板”。她认为，一字之差反映的是几千年来存在的性别文化以及其对当下性别价值认同的影响，说明女性并没有因为社会劳动的参与和经济地位的提高达到总体地位的提高。林仙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对边缘群体/他者与主体、弱者的武器、语言与社会结构、语言与言语、语言的可变性与不可变性、语言与性别的关系等问题的激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语用问题这么简单，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紧紧地跟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虹在其论文中也指出了话语的社会建构性，认为话语暗含了社会的价值秩序。她研究了在广州餐馆和酒吧业中打工的农村“打工妹”的日常话语实践——包括学习词汇、积累谈资、根据语境来切换使用粤语、普通话和家乡话的话语操纵策略，揭示了在城市复杂的微观人际互动中，打工妹们在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以适应城市生活及其要求时，作为社会秩序之体现的话语的裁制力量。该研究推进了文化资本与社会分层的探讨。

郑州大学蒋美华和柴丽红从过程视角出发，探讨有过商业服务业员工职业经历女性自职业变动相关状况。作者认为，商业服务业员工中的女性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限制，甚至会向下流动进入城乡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国家政策、个人人力资本和家庭因素等是影响女性商业服务业员工职业变动的相关因素。

福建省委党校的周玉通过对经验调查数据的分析，回答了“两性是否平等参与权力职业领域？”这一问题。她的结论是，性别不平等存在于权力职业领域。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权力参与中不仅在职业地位上总体较低，而且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与负荷。制度因素、个体目标预期、家庭背景、社会支持和性别意识等因素都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产生显

著影响。

辽宁社会科学院徐海燕对转型期女性职工利益保障的制度选择进行研究，认为制度性歧视，或者说缺少性别视角的制度，阻碍女性职工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

广州大学方英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广州“全职太太”群体的形成进行分析，指出“全职太太”的形成是在市场经济和传统性别秩序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从中折射了中国性别秩序从“毛泽东”时代的“男女一个样”到市场经济作用下的变化。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马冬玲在劳动社会性别分工研究中引入情感劳动这一概念，并探讨了社会学和女性学对情感劳动的女性化及商业化之后果的不同解释，以及情感劳动的理论潜力。作者认为，劳动中情感面向的加入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对劳动者特别是女性的新的剥削形式，情感劳动作为劳动社会性别分工的一种形式，起着掩盖不平等性别关系的作用，是一种生产和再生产性别不平等的机制。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帅庆从卖淫契约的视角对男女两性在社会中权力、经济条件、就业、教育、性道德、文化差异及外部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卖淫契约以平等的形式掩盖了不平等的实质。

二、家庭、婚姻与女性生活

家庭、婚姻是女性重要的生活情境，也一直是性别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女性闲暇、身体、服饰等也开始成为研究性别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

中山大学林晓珊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了城市家庭汽车消费中的身体流动与性别不平等。他的研究发现，在父权制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借助汽车而实现的身体流动存在性别上的差异：一是大多数男性总是作为驾驶者，而大多数女性总是作为乘客，并且通常是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大的汽车优先支配权；二是男性驾车主要是用于工作，而女性驾车主要是用于家务，尤其是接送小孩。从社会文化层面来分析，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汽车的性别隐喻和文化编码，另一方面在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性别区分。林晓珊的发言引起研究者关于汽车使用与家务分工的关系、汽车使用与性别地位、身体流动和社会流动的关联性等问题激烈讨论。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傅大中以改革前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家庭生活为背景，透过家庭角色在性别边界上发生的冲突、演变，揭示社会转型与家庭生活变迁的逻辑关系。他认为，我国家庭角色性别边界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变迁，这种变迁作为社会变革的内容，从制度、社会、家庭多个层面表达了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

广西民族大学甘品元对毛南族L屯改革开放以来婚姻行为调查了描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毛南族婚姻行为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中介、招婿入赘、通婚圈、分家形式等，至于婚姻行为中女性传统的角色扮演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沿海地区的通婚现象也日益增多。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刘大可和祖群英都对福建籍的“大陆新娘”进行了研究。不过，刘大可是运用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的理论，就该群体在台湾经历的排斥和融合过程展开论述。祖群英则探讨了婚姻迁移对迁移地的正、负效应，认为正效应包括对迁出地经济发展、社会观念、增进两岸交流与融合具有积极的作用，负效应包括假结婚等对法律的漠视与践踏现象、婚姻市场的性别比失衡、移民心态与婚姻观的畸形化以及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挑战等。

山东济南大学李伟峰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对明清时期妇女的宗教闲暇生活的普遍化及其特点展开研究，并分析个中缘由。他认为，这一时期妇女户外的闲暇生活存在非常频繁、与宗教密切相关、与妇女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有关、一般得到了家庭和社区的默认、具有反叛意识等特点。这种闲暇活动的空间来自于明清时期政府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社会和家庭的承认以及妇女外出闲暇活动部分与传统礼教的吻合。他指出，明清妇女大规模外出对妇女而言具有重要的生理和心理意义。沈阳师范大学艾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对休闲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甚至将休闲与女性的自由和解放、自我价值的体现结合起来；女性休闲方式及内容出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女性投入休闲的时间、金钱也日益增多。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白蔚对建国以来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别建构变化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女性的身体主要被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与现代消费文化两种权力塑造：新中国初建时被建构为生产身体，文革时期被建构为政治身体，改革开放后女性身体被国家意识形态与现代商业资本、消费文化共同建构为消费身体。女性的消费身体具有双重意义，即现代性悖论：既自由又受制。

服饰的变迁也能反映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性别意识的变化。东北师范大学王晶和刘彦

提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国服饰色彩的性别化特质发生了从清一色的男性装扮,到打造女性味的“粉红女郎”,再到跨越社会性别的中性服饰时尚的历史变迁,这种变迁不仅折射了性别与服饰色彩的时代特征,更映射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复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历史进程。

此外,天津社科院张宝义探讨了女性犯罪“主体”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犯罪动机等特征。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周全德对“生男偏好”情结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关联性进行了思考。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左雪松和夏道玉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解读了“剩女”现象。中南大学杨成胜和李颖将电视连续剧《新结婚时代》中的四位女性按社会地位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对其经济和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云南民族大学陈文超和华中师范大学陈雯研究了家庭主妇在家庭的节约、消费以及家务管理活动等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家庭式的生态行动,认为这些生态行动存在嵌入性、趋利性和实践性,有利于我们家庭以及社会的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

三、农村生活与女性发展

农村妇女始终是性别研究的重点。在本次论坛上,研究者们从权益与生存、家庭地位与满意度、社会参与等方面研究了农村妇女的生活和发展状况,涵盖了女性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河北大学汤兆云利用有关统计资料,阐述了社会性别差异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影响。他认为:社会性别差异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因素;社会性别差异通过男性选择性生育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偏高;缘于社会性别差异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进一步弱化女性地位。汤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出生性别比偏高到底是男性婚姻权问题还是女性出生权问题?为什么只有当涉及到男性婚姻危机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是问题?

刘海大学施国庆和吴小芳基于温州三个村的调查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农村妇女土地保障状况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使得女性群体在土地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容易遭受不公平对待,例如因“预测人口”、“测婚测嫁”等歧视性土地分配方法而受损失;另一方面,土地保障提供的是低层次的保障,而非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造成土地的实际保障能力在虚化。这些因素都大大弱化了土地保障对于妇女的效用。

华中农业大学龚继红和钟涨宝的定量研究分析了农村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行为和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农村妇女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有普遍直接影响,对妇女家庭的家务承担满意度和受尊重满意度有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分工权力普遍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生育权直接影响妇女受尊重的满意度;妇女经济贡献对妇女权力和家庭地位满意度普遍直接影响;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与妇女家庭满意度关系有明显间接影响。

浙江师范大学过军和卢福营从浙江个案出发,探讨了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及其特点。研究发现,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明显表现出了“缺场”;在组织参与中主要扮演配角,发挥辅助功能;在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是典型的“失语”者。作者将这些现象归结为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当、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传承性和滞后性和“力治”的性别偏好等原因。

此外,浙江理工大学鄧玉玲以浙西山区的个案为例,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研究,认为传统的文化观念是农村老年妇女致贫的原因之一。作者从自身鼓励政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治理老年贫困的措施。云南民族大学武承睿思考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性、障碍和对策建议。

四、教育与女性发展

研究者分别从本地区妇女受教育的总体情况、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情况、农村妇女终身学习问题、青少年性别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浙江师范大学王勇对近十五年来浙江省妇女教育地位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妇女的教育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省内妇女教育地位方面仍存在不足:一是性别差距仍然存在;二是妇女之间差距较大,特别是乡村妇女明显落后于市镇妇女;三是比全国以及经济发达省市妇女教育地位要低。

沈阳师范大学王立波的研究发现,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校大学生总人数中的女生比例和女大学生在校人数总体上呈升高趋势,这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但是他认为,在教育机构定位、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学科划分等这些社会面向的大众化的实现还言之尚早。广东韶关学院王丽忠认为,受文化氛围、校园环境、女性话语权空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性别歧视现象在高校以不同表现方式客观存在,同时呈现地域性和隐蔽性特点。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李仕超探讨了影响农村女性终身学习的外部环境,认为政府支持、经济因素、社会观念舆论和空闲时间四个方面比较显著地影响我国农村女性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

河南省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高中建和河南师范大学孟利艳认为,青少年中出现了性别角色模糊化现象,这有利于真正两性平等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应在媒体、社

会中予以肯定。

五、女性学/性别社会学的教研实践与反思

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周美珍女性以“孤独的‘自言自语’”来形容目前女性研究的尴尬境地：不是影响有限就是与现实的妇女距离太远；男性不愿、难以、不便参与；女性研究没有学术地位；妇女问题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导致其边缘化。

从事女性学/性别社会学教学的老师们则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论。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陈晓敏认为，改变女性研究的边缘化现象，行动是关键，而教学实践就是非常重要的实践。她以自己的教学实践为例，对女性学课程建设予以解读和思考，认为女性学课程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须经历研究内容从女性到社会性别、研究教学队伍从个人到团队、教学过程从知识传授到价值认同的转变。特别是她认为教学者应认同课程所蕴涵的价值理念的观念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

在教学方法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丘斯迈基于华中科技大学的教学实践，强调在教学中应打破“独白”局面，采取参与式、互动式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与参与意识，教学互长。

这种对于互动教学的强调得到了济南大学法学院梁丽霞和李伟峰的支持。她/他们以“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为例，探讨“多元一体化”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即“以学生为主体的多元互动模式”。该模式具有互动主体的多重性、互动过程的连续性、互动空间的拓展性几个特点，其实施包括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教学设计、课前互动教学的准备工作、课堂中互动教学的实施策略、课堂外互动教学的进一步延展和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的建构。

黑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王磊和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王晶通过对性别社会学课程学生进行问卷和访谈，发现，学生中认为性别社会学这一课程名称很有吸引力和较有吸引力的、认为两性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学问都达到87%。她们认为，这和该课程秉持的教学理念、方法和内容上的前沿性、教学过程中的赋权性和行动性分不开。

首都师范大学高永平介绍了自己开性别社会学课程的初衷和方法。他认为，教学既是学术兴趣，也是社会责任。他所开设的性别学课程从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多学科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性和社会性别的教育。

四川省社科院郭虹在评论中认为，女性学/性别社会学课程的增加、参与者特别是男性参与者的增加、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的创新等，预示着社会性别教学的良好发展前景。不过，如何主流化和本土化仍是今后教研实践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除了上述议题，本次大会上与性别有关的议题还包括：辽宁社会科学院徐海燕就女性发展中大众传媒的性别意识进行了审视与反思；中国传媒大学谢进川对传媒反拐报道框架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反思；广州大学方英探讨了妇联工作如何引入社会工作以更好的满足单亲家庭的需要；韩国汉阳大学沈英姬对20世纪80年代后韩、中女性运动比较，讨论了自律性强的女性运动组织与女性运动的得失。

最后，本次论坛负责人、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王金玲做了本论坛的总结发言。她指出，本次论坛收到的论文数量之多、领域之宽、研究方法之丰富以及论坛参与者之踊跃，充分显示了性别研究和性别论坛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她认为，三届性别论坛的发展显示了性别研究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即从就妇女谈妇女发展到将性别视角渗透到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第二个特点是从西方的理论框架走向从本土的知识，甚至发展成某种本土的发展论、本土的立场；第三个特点是形成了一个多元、多样的平台，为今后交流合作打下了基础。代表本论坛做大会发言的东北师范大学王晶也指出，本论坛的研究具有反宏大叙事、反逻各斯中心、反生产中心等特点，既有对特定群体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地位的关注，也有对性别差异的关注；既有对政治、经济环境对女性发展影响的关注，也有对日常生活的解构。

[1] 马冬玲（1977-），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是女性学和社会学。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 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请注明：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